

## 学林

← (上接9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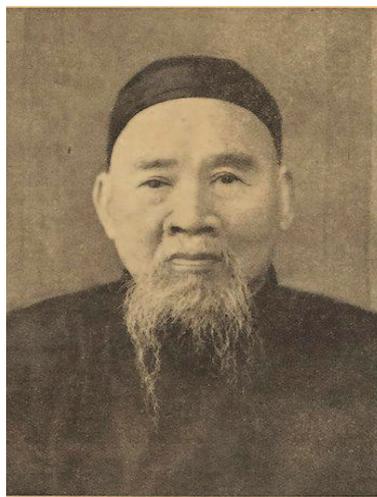
曰教,经纬万端,而所以出治之本,则惟伦理而已。”也就是说,西学固然可以为经世之用,但中学无论如何都应当是体,这也就是张之洞著名的“中体西用”论。在晚清,“中体西用”论甚至可以说是朝野共识,流风所及,几于无人不晓。

晚清以来的“保守士人”,其实很多与张之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有“张之洞学人圈”的称谓。陆胤提及,张之洞学人圈以其“清流”底色,往往执着于名教而不善于随时,所以如梁鼎芬、沈曾植、曹元弼、陈三立、罗振玉等,鼎革以后多为遗民。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所谓的“遗民”,在思想的整体倾向上仍然继续着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思路。从比较正面的视角来看,他们其实并不是“保守”“顽固”地排斥西学,反而会主张学习西学,吸收西学。像马贞榆,即主张学生当学西文,哪怕“一年二年之西文,亦当胜于全然不学”,若“全不晓西文”,则将来恐“被晓西文者欺死”。但他们更强调的,仍然是要以“中学”作为学问人生的根基。在他们那里,“中体”是不可动摇的,“西学”只能服务于“中体”。这也就意味着,与“时风”倡言“西学为用”不同,他们着重在“中学为体”。对同一“口号”的不同侧重,实际上已经显现出不同群体对于中国未来不同发展趋向之认识的根本差异。

但如罗志田教授所指出的,在现实上,西学西政等逐步蚕食的结果,已经是“从西学不能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吴虞“打孔家店”、鲁迅大

肆抨击“吃人的礼教”,转移一时之社会风气,“中学”不要说不能为体,甚至已经有灭绝丧尽的危机。而这,正是“保守士人”最为痛心的。像曹元弼痛感“世道日非,乾坤几息”,唐文治慨叹“自近世经济之名变为洋务,士益但知有用,而不知有体于此,而无以正其本原。窃恐世道人心,如江河之日下”,“礼教沦胥,天下滔滔,莫知所届,守先待后,一发千钧”。故“此时纠正风俗人心,非兴复礼教礼乐无由,一线曙光,或在此耳”。唐文治早年曾游历欧美,考察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教育等情况,在外务部、商部及后来的农工商部都曾身居高位,也实际办理过各种外交、通商、铁路等事务,并非不通西学西政的“迂夫子”,反而比高喊“西化”口号的大多数人更了解西方,也更了解中国。以他为代表的“保守士人”宣扬保存“礼教”,便不能只是简单斥责他们顽固落后而已。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吃人的礼教”,与“保守士人”坚守的“礼教”,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一回事。所谓“吃人的礼教”,重点在于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形成的绝对的“君父家长制”,即君主、父祖、男子对臣下、子弟、妻子等具有绝对的权力,由后者对前者的依附关系而造成对个体的压迫与限制。而“保守士人”心目中的“礼教”,则是治天下之大本大原,是安顿人间的基本政治与社会秩序。曹元弼在所著《复礼堂文集序》中,开篇即明确宣示:“道之大原出乎天,生乎人心,觉乎圣,率



唐文治



张之洞

由乎民,达乎天下。其本三纲,其序五伦。其全体大用,因人爱亲敬亲、与生俱生之天良而扩充之,使天下尊卑、上下、亲疏、长幼、外内各循其分,各尽其情,各竭其力,合敬同爱,以相生、相养、相保而不相杀。自伏羲至于周公,其为道也一。”意思是说,“礼教”的“三纲五伦”,出自天命,依于人心,是人类社会自然而然形成的,它从每个人天生的良知发出,而目的则在使每个人能够各遂其生。

这样说起来似乎有些“太虚”,或许可以看下“保守”士人所坚持和为什么要坚持的一些具体的礼仪制度。曹元弼曾著有《礼经校释》,主要即阐发《仪礼》一书中各种仪节之所然及所以然,特请唐文治作序。唐氏在序中便特别表彰了曹元弼阐发“礼义”的要旨,如“释《冠礼注》‘适子冠于阼,少北,避主人’,谓二十成人,渐有代亲之端,故冠于阼以著其义,人子于此,当有怆然不安者。又谓丧礼反哭升堂,反诸其所作;妇人于室,反诸其

所养,其端实于冠子、饘妇之日已早见之,事有必至,为人子者宜发深省,及时以养。是言也,仁厚恳挚,真可以发天下人子孝亲之良心”,皆从礼仪的细微之处感发人内在的孝心。故“是书岂特高密之功臣,乃实有得于古圣人尽性立命之旨,与夫修齐治平之原,维持世道人心,所裨诚非浅鲜也”。宋以来,便有“礼为天理节文”之说,而天理之在于人者,便是人各自的“性命”,是人人皆具的“良知”。在实践中贯彻礼仪制度,便是复性尽命致良知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它的目的。

也就是说,或者从根本的层面来说,“保守士人”所关注和重视的,其实是人,是人心!礼教,不过是落实于人内在性命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其中最为直接的,便是家庭(家族)内的关系。贯彻这种人伦关系的最直接的表现,则是丧服制度。这便是清末民国一批“保守士人”主张挽救世道人心自人伦孝悌始,自《孝经》《丧服》始的重要原因之一。沈曾植在与黄绍箕的信(1898年)中称颂曹元弼的《孝经六艺大道录》,“粹然儒言,有关世教”,“今日世道之大患在少陵长、贱犯贵,其救之术曰:出则事公卿,人则事父兄。《论语》开章首言学,举世知之;第二章重言孝弟,乃举世忽之”,强调的也是以孝悌之道救世。张锡恭以数十年精力成《丧服郑氏学》一书,为千年来《丧服》研究集大成之作。曹元弼在为该书作序时,对《丧服》在群经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他们所处时势中讲明丧服的重要意义,有深刻揭示。他所谓“《丧服》一篇,三纲五伦一以贯之”,“天下之达道五,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冠、昏、丧、祭、聘、觐、射、乡,伦理之至教,爱敬之精义,总会于丧服。故先王修身之天下之道

在礼,而丧服者,又礼之本也”;“今欲出天下于水火,而登之衽席,拔万万生灵于兽蹄鸟迹之中,而返之入道,遏杀机而全生理,必自正人伦始,正人伦自讲明礼服始。”皆在说明丧服是人类社会种种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表现形式。丧服可以得到准确的施行,则人类的种种关系便可藉此理顺,安顿于礼制之中,内则人性、情感都可以自然发抒而不违天理,外则修齐治平都可以顺利实现,时代的危机可以解决,中华文明也可以从夷狄乃至禽兽之中重新回复到人道。

这一思路,同样见于清末最“革命”的思想家章太炎晚年的“复古”主张。章太炎曾后悔早岁为了“排满”而攻击孔子,然“驯不及舌”,影响已然造成,且愈演愈烈。所以他又“退回”到“保守”的立场,主张读经,主张读“新四书”,即《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章太炎眼中的二三十年代,其实已经与曹元弼、唐文治等人并无太大的区别。“今者新奇之说,流为格言,日驱于顽固而不返者,曰‘发展个性也’,曰‘打倒偶像也’。发展个性,则所趣止于声色货利,而礼义廉耻,一切可以不顾。打倒偶像者,凡一切有名无形者,皆以偶像观之,若国家,若政治,若法律,若道德,无往而非偶像者,亦无往而不可打倒者。洵若是,则于禽兽奚择焉?世以是乱,国以是危,而种族亦将以是而灭亡矣。”“国家昏乱,礼教几于坠地。然一二新学小生之言,固未能尽变民俗。如丧服一事,自礼俗以至今兹,二千年,未有能废者也。”所针对的,都是在他影响下青出于蓝而日趋于新的“西方新说”,他所欲藉以保存中华民族的经典,不仅仅是在历史和语



樊增祥



梁鼎芬